

◆ 读者投稿 ◆

养父的粮食情结

文/刘小连(中国江西)

养父经历过民国乱世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从小饱尝饥饿折磨之苦；大集体时代他又担任过生产队粮食保管员，掌管过一、两百号人的嘴巴和肚子，因此对粮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常有不近情理之举。听说他曾经不依不饶，硬是把一个企图多吃多占、搞特殊化的生产队长告下了台，还把两个挖洞潜入粮仓、盗窃粮食未遂的亲属送进了监狱。

改革开放、分田到户后，养父如鱼得水，在村里率先引种杂交水稻，采用科学施肥技术，通过精耕细作，我们家的粮食连年丰产，自给有余。接着他又主动承包了地处偏远山区的一片荒田，扩大水稻种植规模，并利用我们家靠近圩场公路边的优势，自酿自卖开了一间水酒店。尽管生活环境、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了，但他始终坚持粗茶淡饭，从不大吃大喝，对家里的吃穿用度管制到近乎抠门的地步。

我小时候爱挑食，每次进餐都会落下一桌面的饭粒菜屑，养父总是低着头、伸出嘴，仿佛一台轻便精密的吸尘器，小心翼翼地把渗透着我的鼻涕和口水的混合物一扫而光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因家访滞留在我们家吃饭，也许是饭菜实在不合她的口味，一碗饭只吃到一半时，她欲言又止地想找个地方倒掉。养父见状，急忙接过来倒在自己的碗里，一边吃一边嘟囔着自嘲：“我要的就是这个味道！”

养父木讷寡言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只好编造“浪费粮食要遭雷公打”之类的迷信谎言来吓唬我。其实，那时他就是讲得出，我也不会听，更不会懂。直到我十二岁那年，山上的野猪骤然增多起来，一夜之间把我们家的稻田糟蹋得颗粒无收，养父一个老男人竟绝望得嚎啕大哭，犹如混沌沌沌中一声霹雳，真把我给吓坏了，隐隐约约感受到了粮食对于农民的份量。

事后，养父一连数日带着干粮和砍柴刀进山，意外地捉回了一窝刚出生不久的黑毛小野猪。用现成的米糠、酒糟精心饲养了几个月，城里的野味餐馆闻风而至，全部高价收购。养父又用这笔“巨款”买回来一头健壮的大水牛，农忙时除了耕作自己的责任田，租给别人每年还能收获十多担稻谷，如此也算是因猪得牛、因祸得福了。正因有上述种种经历，养父被无聊之人添油加醋，取了两个半褒半贬的绰号——“黑面猪”、“骚牛牯”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头大水牛终究是功不抵过，给我们闯下了一场大祸。那天下午，我听从养父的吩咐上山放牛，由于只顾着采摘野果子吃，没有注意到它溜进了山脚下刘二狗的庄稼地里。正在干活的刘二狗抡起锄头就打，结果把那厮给打疯了，撒开四蹄漫山遍野一阵狂奔，邻居钟三娘的小孩躲闪不及，整个人被牛角尖顶了起来。危急关头，幸亏本族一个堂嫂挺身而出，她“呃哞呃哞”的柔声叫唤着，终于成功地稳住了受到刺激的水牛，把小孩从牛角尖上救了下来。

晚上，刘二狗、钟三娘两家人找上门来闹事，张口“黑面猪”、闭嘴“骚牛牯”的骂不绝口。养父自知理亏，低声下气地答应给予他们适当的赔偿，好不容易才把风波平息。随后，他拿起一块竹片劈头盖脸向我打来，这是记忆中养父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对我动粗。我惊恐地连连后退，不料被身后的椅子绊住了脚，重重地一跤跌在地上。这一跌，后果很严重，我的左手臂立时红肿起来，痛得我呼爹喊娘，遍地打滚。养父见势不妙，赶紧把我背去医院检查，原来是手臂关节骨折了，虽然得到了及时医治，但未能复位到原状。

都说“积谷防饥，养子防老”，养父终

日劳碌、一生节俭，含辛茹苦把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弃婴抚养长大，但我并没有尽到“雏既壮而能飞兮，乃衔食而反哺”的孝道责任，反而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。自此以后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和肝炎，但他坚持不肯住院医疗。按照有关政策，他本来可以申请五保，入住敬老院，但他也选择了放弃。他说他不中用了，没有必要为他浪费钱财。就这样，他每天只吃两餐稀饭，服几片止痛药，安详地在千禧年六月那个火热的父亲节驾鹤西去了，享年76岁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，我自己也变成了三个孩子的衣食父母，一天到晚总在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，真切地体会到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。遗憾的是，孩子们跟我小时候一样“饱人不知饿人饥”，浪费粮食相当严重。我不得不学着养父的样子替他们处理残羹剩饭，凭着多少识得几个字，照本宣科向他们大谈“民以食为天”、“粒粒皆辛苦”。我不愿意他们都如上一辈那样辛苦麻木地生活，也不愿意他们都如“垮掉的一代”那样放浪不羁地生活，他们应该有更安全、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活。

(版权文章，转载请注明出处。)



我的父亲

作者：老鬼

老鬼：本名马波，著有《血色黄昏》、《血与铁》和《母亲杨沫》等。老鬼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：父亲马建民在新中国建立后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委书记等要职，后官至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；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迈入革命作家之列。



作者的父亲马建民

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。这一生中，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，为草原上的知青，为反四人帮而判长期徒刑的同事，为陷入图圈的北大同学，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，为晚年反璞归真的母亲……我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，却没心思给父亲写。因为，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。父亲是母亲的人党介绍人，也是《青春之歌》中江华的原型。但在我眼里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，那么和蔼可亲。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，应共识网之约，为他写篇文章。

一、对孩子冷酷

1951年，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，离开疼我的姑姑、奶奶，来到陌生的北京。4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。见了父亲“爸爸”叫不出口。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。他下班后不理我，从没抱过我，也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，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相（长大了更是没有）。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（两次动手术，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）。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。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，他在前面走，我跟在后面，后来他越走越快，我跟不上，眼看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，我急哭了，他头也不回。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。反正我跟父亲上街，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，一根冰棍，一件玩具。只记得过年时，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。

我从托儿所到小学，到中学长年住校。每星期回家一次。到家后，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，我去他的房间，也冷冷淡淡。

他出去看望朋友时，从不带我，好像嫌我给他丢人。跟老战友说起我时，总是数落，陈述我的种种毛病。他有个习惯，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。不只是对我，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。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，平易近人，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样子狰狞可怕。

我小学4年级11岁时，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。本来说好让我去，后来又不让我去了。父母走出门后，我在保姆面前哭了。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，返回来拿。见我哭了，上来

就抽我一耳光。还有一年春节，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。吃饭时，可能是我迫不及待，抢先动了筷子，父亲发怒，当着大家面，抬手抽了我一大嘴巴。50多年后的2014年，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，她还记得这次抽我，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。

所以，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。他对我没感情，我对他也没感情。管父亲叫“爸爸”非常勉强，尽量不叫他。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，害怕之极。一到寒暑假，父母嫌我在家淘气，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。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亲情的温馨。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要大哭一场。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穷亲人，他们真诚关心我，待见我。回老家吃的，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，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，把我当回事，我能够说了算。不像在北京家中，跟寄人篱下一样，被忽视，被冷遇，被遗忘。

困难时期，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，还吃不饱，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。父亲从来没有。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。学校开家长会，他从来不去。总让在供销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。记忆中，父亲对我最好的表示是初一时，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。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，送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。受宠若惊，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新的《中国分省地图册》，交给母亲，托母亲转给他（那时候，我特别害怕他，他不叫我，都不敢进他的房间）。但一顿骂，一顿打，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。

父亲不止打我，还打姐姐小胖。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，最被溺爱，也最敢跟父亲顶嘴（我小时可一点不敢）。小胖都上大学了，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，不许小胖在家吃饭，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。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，痛斥父亲的“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，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。”

我二叔（爸爸的大弟弟）在农村老家务农，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，十分疼爱，从没打过他一下。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。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，看着看着就狠抽了他一耳光。把那孩子打懵了，呆若木鸡。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。打自己小孩的很多，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，下手那么重，恐怕就少见了。人家是客人，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，几十年后，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，说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尤其是我为申请人团割破手指被打，令我对我父亲恨之人骨。1963年，我初中三毕业前，很想入团。就写了个申请书，在交给班团支书时，用小刀割破左手手指，将血洒在申请书上。之后，也没去卫生室包扎，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。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。不料回

到家后，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人团，割破了手指，都大发雷霆。父亲越骂越生气，开始梆梆抽我耳光，并用大皮鞋踢我。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人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（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抗战到底的决心把一个手指头刺下来交给他，他还表扬过这人）。我也没干坏事，凭什么拳打脚踢我？当时我16岁，挨打时一声不吭，首次愤怒地瞪着他。打完，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。自己流了那么多血，左裤子湿透了，还挨顿暴打！实在忍无可忍，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，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署名。我悲愤填膺，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，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，是个暴君，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！

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打我，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。1965年，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，发他了一个军棉袄。1966年他回北京后，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。我听后非常高兴。那时候，中学生们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。可最后，父亲却没给我，送给别人了。理由是给我穿，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，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。我白高兴一场，自然对他产生怨恨。——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？

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，父亲随意翻动，甚至偷走（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）。他反对哥哥练武术，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、飞镖、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。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，非常珍惜。下乡时没来得及拿，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。

文革中他受批判，处境开始不好，我无动于衷，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。认为他官气十足，在家里称王称霸，该炮轰炮轰他了。后来北京红卫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。我也动了心，并在1967年4月毫不留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，企图一去不复返的上前线抗美援朝，宁肯死在战场，也不再回这个家。因为感觉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。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。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，烧毁了很多罪证等。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。

父亲自然深受伤害，认为白养了我一场，大骂我是白眼狼。我下乡内蒙古后，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，他不理不睬，一点不管，可能还隐隐高兴团替他报了仇。

1976年初，发现我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，写信向他索要，并警告他不要烧毁，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。他的回答是声明跟我断绝一切关系！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，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。那时，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，举目无亲。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，还让他的老战友——把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。等于从背后给

了我一刀，令我猝不及防。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，也随之离我而去。那段举目无亲，无家可归的日子，刻骨铭心。

打倒四人帮后，父亲的秘书蒋雪蛟去看望父亲，得知我在大同，说“恰好要去大同办事，可以去看看小波。”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你不要去看他，照顾他，让他自己锻炼，自己闯。”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。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了来往，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，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。

1977年底，凭自己的作文，考上北京大学之后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父亲与我恢复了关系。趁他高兴时，我对他说：你要对我好，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。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，一点不承认对我不好。反问：我们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上学，帮你摘了帽子，给你调回内地，哪点对你不好了？痛骂我“忘恩负义”、“过河拆桥”、“胳膊肘往外拐”、是个“内奸”、“白眼狼”等等。

不久，又因为政治观点问题，跟他争辩起来，父亲见我顶撞他，再次跟我断绝关系。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翻译，他逼姐夫告诉那个女翻译，我是个危险分子，劝她不要与我来往……在北大期间，寒暑假时，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。只有我一个仍住在宿舍里，饱尝了“丧家之犬”的滋味。

因此，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，就是训斥，就是冷遇，就是被赶出家门的屈辱，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。

晚年，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了一些。逢年过节，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，都长了毛，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，送给我。但平时我仍旧刻意跟他保持距离。因为你一接近他多了，待他好一些，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图，会突然变脸。

所以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。

(下接第10版→)